

师母张兆和与贤契汪曾祺

□ 金实秋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得知这一噩耗的当天,张兆和就送去花篮,花篮两旁的黑色缎带上写着:贤契曾祺安息(上款),兆和率晚辈敬挽(落款)。花篮置放在汪曾祺家灵台的前面,这是灵堂中唯一置放的花篮。5月28日,北京八宝山公墓吊唁大厅举行汪曾祺遗体告别仪式,年近八旬的张兆和执意要去送曾祺最后一程。她不仅是前来参加告别汪曾祺人群中最长的一位,也是来得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张兆和手执一朵待放的玫瑰,饱含着泪水,两位晚辈搀扶着她,在《天鹅》乐曲声中一步一步地缓缓挪行……作家顾村言看了当时拍摄的照片,十分感动,在《清冷与小温》中写了这一句话:“照片上的张兆和眼睛里满是泪水,浸满了悲痛。”那天,张兆和对汪曾祺子女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晚,有一位记者电话采访了张兆和,她叹惜道:“像他(汪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这两句话,当时就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而在以后评价汪曾祺的文章中,其引用率也极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大概是关于汪曾祺评价的最具有概括性和影响力的两句话了。

张兆和曾写给汪曾祺一封“很长的信”,这是汪先生终生难忘的信,他曾多次与别人说过,也在文章中再三提及。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一时找不到职业,生活困窘,情绪极坏,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汪曾祺说,从文先生得知后,立即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信中说到的三姐,即张兆和也,她在张家姐妹中是老三。这两封信,对汪曾祺的一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汪曾祺终生铭记、终生感恩。

1961年,汪曾祺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有时不免会消沉迷茫、心灰意懒。沈从文写信鼓励汪曾祺不要忘了写作,他劝慰弟子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我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黄)永玉!三人者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汪曾祺一直保存着这封信,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但信中重要的话,他记得清清楚楚,脑海中常常萦回着信中这一段贴心的激励之言。

1961年,汪曾祺写了小说《羊舍一夜》,便随即给了沈从文和张兆和,并寄交《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京津及华北地区初审的崔道怡看了,十分喜欢“这种纯正优美、诗韵温馨的小说。随即提交复审”。其时张兆和也任职于《人民文学》,与崔道怡同事,她对崔道怡介绍说,曾祺是从文的学生,文笔很好,并建议请黄永玉为小说做插图。当时,张兆和的话,无疑是有一定分量的,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沈先生八十寿辰,从文先生不告诉人准确日期,汪曾祺去问,沈则说已经过了。汪曾祺“只好写了一首诗补为之寿”,随后便写信告诉林斤澜:“他一家看

了都很高兴。”当然,这个“一家”,首先就是沈先生和沈师母啦!

对三姐给他的肯定和赞许,哪怕只是一言两语,汪曾祺都是很在意的。有一次在沈先生家,他们师生俩聊起了从文先生的《月下小景》,汪曾祺说:“‘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这写得很美,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作家写到甲虫的气味!”这时,张兆和“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而很兴奋,说:“哎!甲虫的气味!”(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

至于张兆和对孩子、保姆的“抒情气氛”,汪曾祺也有文字流露了他对师母的“尊崇”。比如,“沈先生、沈师母和儿子、儿媳、孙女是和睦而平等的。”“‘有一阵,儿子、儿媳不在身边,孙女跟着奶奶过。这位祖母对孙女全不像是一个祖母,倒像是一个大姐姐带着最小的妹妹,对她的一切情绪都尊重。……去年春节,孙女要搞猜谜活动,祖母就帮着选择、抄写,在屋里拉了几条线绳,把谜语一条一条粘挂在线绳上。有客人来,不论是谁,都得受孙女的约束:猜中一条,发糖一块。有一位爷爷,一条也没猜着,就只好喝清茶。’沈先生请过一位保姆王嫂,和沈家一直相处极好。离开沈家多年,还一直来往。王嫂‘去年在家里和儿子怄了一点气,到沈家来住了几天,沈师母陪着她出出进进,像陪着一个老姐姐’。(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因有刊物约汪曾祺写关于沈从文转业的文章,汪曾祺要夫人施松卿打电话给张兆和,张兆和很是支持,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张兆和给了汪曾祺几封沈从文的信,汪曾祺说:“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1992年10月24日,学者巨文教就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专程拜访请教张兆和。临别前,巨文教告诉张兆和,明天将去拜访汪曾祺。张兆和对他:“到汪先生处,会有更多收获。”这一句话,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张兆和对汪曾祺的信任与赞许,并由此感悟到汪曾祺对从文先生的了解与理解已达何等的广度和深度。

沈从文先生去世后,汪曾祺协助张兆和、参与了《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别集》的编辑出版,并应邀为这两本大书的顾问。同时先后参加这两本大书编辑工作的张永中先生还记得一个细节:在编辑《全集》期间,张兆和曾几次请有关同志吃饭,“一次是专门去全聚德吃烤鸭。那天,汪曾祺先生也在,还喝了点酒,脸呈了酱红,讲话声音有点嘶哑,却洪亮。”(张永中《杜鹃声里的记忆——关于沈从文墓的一些旧事》)从文先生在世时曾有个愿望,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便于收藏携带,便于翻阅”,并基本选定了作品。他去世不久,岳麓书社与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迅速就编辑工作进行了沟通、磋商并达成共识。在为这套袖珍本定书名时,汪

曾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借汪朗的话说,这书名是老头儿“琢磨”出来的。一开始这套书名拟叫《沈从文作品选》,大家认为太俗,不好;叫《沈从文作品精选》吧,感觉也流于一般了。最后,汪曾祺建议为《沈从文别集》,张兆和与同事们都觉得好,欣然从之。

用学者郜元宝的话说,“汪曾祺对这位师母是非常崇敬的。”(郜元宝《汪曾祺写沪语》)此言不虚也!这个崇敬,虽与老师沈从文不无关联,但三姐的文学天赋和仁者情怀,是汪曾祺由衷崇敬的根本缘由。张兆和是名副其实的才女,早在中学二年级就创作了剧本《王昭君》,并发表在乐益女中的毕业校刊上。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于1934年即刊发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巴金说:“她的短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巴金《怀念从文》)这一年,张兆和才二十四五岁。1941年,她以《湖畔》为书名的五篇小说集结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湖畔》列为民国女作家“虹影”系列丛书,与苏雪林、张爱玲、林徽因等排为一列。有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认为,张兆和的小说“若署上她丈夫的名,也看不出丝毫端倪”。也有人认为她“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被深深遮蔽掉的作家”,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她卓越超凡的文学才华是不可否认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3年,她翻译了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兰姆的小说《我的水手舅舅》,刊发于《西湖文苑》第一卷第三期上。于此,亦可窥见她的阅读层面和翻译才华。而至于说到张兆和对沈从文在文学上、学术研究上的作用,那几乎就是公认的了。尤其是沈从文去世后,她对整理出版沈从文作品集、对沈从文研究的贡献,更是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沈从文传》的作者、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说:“我每次访问沈从文,至少有张兆和先生在场帮助翻译。”因为沈从文只会说湘西话,别人很难听得懂,这时张兆和就起到了“翻译”的作用。学者陈子善也采访过沈从文,也听不懂沈先生的“湘音”,他说:“老人家很风趣,他讲了以后会笑,但我不知道他笑什么。有时候张先生在,她会做翻译,有时候张先生不在,只能不懂装懂。”张兆和不仅充当了翻译的角色,有时也是沈从文作品的助编与审读。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是三姐帮助整理校对的。有时还要为沈先生改信里和作品中的讹误。在一封信里,张兆和直率地批评从文先生:“你这个字老是用错,我给你改过多少次,你还是用错!”盖沈先生用字不规范也。汪曾祺说张兆和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毫不夸张,确实如此;这两个“极其”,亦表达了汪曾祺对三姐的崇敬之心、感佩之情。

汪曾祺写三姐的文字虽着墨不多,但小中见大、寄情深厚;张兆和对汪曾祺评论也不过是片言只语,然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的写作能力。

第二篇我写的还是工作经历。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一气呵成。投稿《高邮日报》后一周就发表了,这更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

第三篇我尝试写父亲入党的经历,体现父亲对党的热爱。此时的父亲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我对他的部队生活和入党经历只能查考于他以前的作品。经过慢慢梳理,终于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写好初稿后,我一次次反复地修改,然后请同事看后提宝贵意见。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我的母亲经常就是他的第一读者,因为读者会第一眼看出文章的不足之处。文章见报后,高兴的同时又夹杂着伤心、失落,站在我面前的父亲已不能和女儿分享这份快乐。

1991年9月30日至10月7日上午,回到高邮的汪曾祺、施松卿夫妇,下榻新建的北海大酒店一间套房,东为卧室、西为接待室。我、金家渝及汪丽纹的二女儿,在府前街原高邮中学一间房中,边吃香蕉边与施松卿老师闲谈。

有人说老年的施松卿老师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果真不错,皮肤白皙,风度优雅。我问:“你与汪曾祺先生结婚就这么简单:两人游北海公园,在附近一家面馆吃面条,当晚向沈从文、张兆和家报喜。”她说:“是的,1949年与老汪在北京结婚,1950年6月2日生下汪朗这男娃。”我问:“你俩新房在何处?”她说:“我工作单位的两间宿舍。”我说:“你当时27岁,汪先生25岁,家长同意吗?”她说:“我们是自由恋爱。我在西语系读书,他在中文系读书。他在西南联大就发表文章,长相尚可,穿着土冒。”我说:“他出行时、回邮时穿着得体,常穿米黄色风衣,这次回邮也是这样。接待《扬州日报》记者,更是西装革履又系领带。”施老师说:“那时是在昆明,现在不穿好一点要使人笑话。”我说:“你才貌双全、外秀内慧,上西南联大时被人称为林黛玉,有这话吗?”“有过,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已有第三代,风光不再,不要这样夸我,陈其昌同志。”我说:“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要把定婚的礼物给你,你不要,有这事吗?”她说:“有,我要做独立女性。结婚我也没有陪嫁,简朴平常过日子,蛮好!”

闲及二老北京旧事,我问:“汪曾祺先生被划为‘右派’下放,你正在单位有事,没有回来送他?”她说:“是的,单位不让请假。我回来见老汪留一字条:‘我将去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争取三年改造好。家里的事,松卿你操心了。’”我又问:“你俩在北海公园遛弯(散步)时,看见一个老人推着车,车上坐着他的老伴。你说:‘我如果有一天需要你推车,你推不推?’汪老开始未回答,你又追问一句,他说:‘推,肯定推!’有这事吗?”她说:“是的,有这事。”

大花脸

□ 陈仁存

“大花脸”周文杰是东大街窑巷口做寿衣的,只因他从右眼角到腮帮子、耳后根有好大一块红色胎记而得此浑名。周家做这门手艺已经好几代了,到他这一代可能是因为他的大花脸而名声大噪。县长的大老婆、杨七房的三姨太、夏府的老太爷……有钱的大户人家“老”了人,寿衣都是请他做的。“黄金入柜”,男款长袍短套、女款五领三腰,不是飞针走线而是细脚如麻。要是邻近的,他会走过去;远些的、特别重要的,他会叫一辆黄包车到现场,看有没有缝得不周到的。在东大街上,尤其是老太太们,五十寿诞之前就在大花脸这里把寿衣定做回家了,夏天晒服拿出来晾晾,看上去花花绿绿的,但是并不瘆人,因为大花脸对布料颜色的搭配养眼,“打旋风”的裙子是府绸的,打上荷叶边,仿佛穿上即可羽化登仙。

大花脸周文杰在县立第五小学读过五年新学堂,被灌输了不少新知识、新思想,老师教拉二胡都是用简谱,而不是晦涩的工尺调——“尺、工、凡、六、五、合、四、一、上”。他学得快,拉得好。除了脸上的胎记,他的脸型、身材都属上乘,礼帽长衫,一副金丝边眼镜,面部的不足被遮盖了一大半。轻佻的时候也出入过风月场,喝花酒、打茶围。他的书法初临“二王”,后习米芾的《蜀素帖》,格调流畅、中和,润而不肥。他的二胡、京胡也拉得特有个性,似有穿林越壑、雨打芭蕉之声。兴致所来也能赋得《临江仙》《八声甘州》。做寿衣的职业虽然过于清冷,但并不妨碍他过性情中人的生活。他是京剧票友,擅演麒派,本可以下海却没有,是因为小县城天地狭窄。他登台演过《徐策跑城》的徐策,火了高邮城。他登台演过《断密涧》的李密,大花脸演大花脸。

又过了多少年,大花脸的寿衣店开到大街上来了,在唐二麻子的“伊美”时装店西隔壁。这让人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两个耳聋的老家伙经常在一起互相调侃,老腔老调地哼戏、喝酒,谈起往事,唠唠叨叨个没完。

有一天,一个导游带三个老外进了大花脸的寿衣店。导游告诉老外,这里面卖的是“Tang/costume!”女儿周琴听得懂英语。导游把寿衣说成是“唐装”,想蒙骗外国人,从中赚一笔。周琴告诉他们:“These/are/Clothes/of/the/sleeping/man!”(这些是睡了之人穿的衣服!)导游大吃一惊,老外也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把三个老外带到唐二麻子的“伊美”,让他们买上真正的唐装。

大花脸一辈子做明白人,不做亏心事。女儿也是。

我的习作之路

□ 李莲

上小学时,我怕写作文,每次都是极力地凑数字。犹记得我写的“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蔚蓝的天空中漂浮着朵朵白云”,被老师当作病句例题讲解过。

我的父亲很喜欢写作。他写过一篇关于飞机机械师工作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我读初中时为父亲誊写了大量的手稿。对于如何写作,他对我说:“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文章的开头很重要,如果写得不好,编辑甚至都不会再往下看,每个标点符号也一定要正确。”

父亲的爱好感染了我,想起以往的工作经历,我也有了创作的冲动。2003